

我的黨外運動時代*

四、五十歲以下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台灣曾經有過一段荒誕不經但殘酷無比的年代。那個年代的最高潮發生於1975年，以軍事戒嚴統治台灣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蔣介石於4月5日去逝，接下來一個月，台灣舉國服喪，軍公教全體人人被迫在肩膀上掛黑布條，表示家有喪事。所有娛樂事業包括電影院、歌廳、舞廳暫停一個月，僅有的三台電視也停止播放娛樂性的節目。一年後，他的兒子也是接班人蔣經國，在台北市市中心精華地段，為他老爸建築了華麗無比仿照南京中山陵格局的中正紀念堂。上個世紀全世界右翼的獨裁者，蔣介石應該是命運最好的，這四十年來，他面帶慈祥微笑的碩大銅像，靜坐在廟中殿堂，廟埕廣場任何集會抗議，都動不了他一根寒毛。四十年前黨外運動就是在這樣荒誕的氛圍下展開的。

1949年蔣介石來台，前兩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的戒嚴令軍事統治，台灣政治上的反對者銷聲匿跡，只存在著偶爾的、零星的、小範圍的、小區域的異議者，接下來的二十年，是台灣歷史上最惡名昭彰的白色恐怖時代。

白色恐怖，不只鎮壓當代異議者，也讓歷史傳承出現斷層。七〇年代展開的早期黨外運動，可以說是從歷史的荒原出發，一方面搜索尋找失散各地隱名埋姓的同志，一方面探求我們自身的歷史線索。

我直到1979年，因為李南衡先生出版一套五冊的《日據下台灣新文學》，

* 本文為「黨外·野百合·樂生·新農運——社運工作者的世代對話」(2014年6月15日，台北月涵堂)之發言修訂稿。

我陪同他到彰化郊外拍攝賴和先生的墳墓，那時才知道半個世紀前台灣的文學作品，才知道賴和、楊逵、張我軍、張深切，我們的殖民地台灣文學前輩。同樣的，我在1978年幫彰化競選國大代表的姚嘉文寫一份傳單，從葉榮鐘先生寫的〈台灣民族運動史〉擷取了1926年彰化發生蔗農抗爭的二林事件，身為彰化人的律師姚嘉文告訴我他完全不知此事。

要說黨外運動的展開，必須從1975年底宜蘭郭雨新先生的選舉談起。當時在反對派已有名氣黨外省議員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參選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立法委員，以八萬多票為落選頭，他敗在「兩票」，一是買票，國民黨支持的三重富商林榮三全面賄選（沒有錯，就是那個林榮三），二是作票，單單宜蘭縣的廢票就超過八萬票。開票當晚，宜蘭市街頭擠滿不甘心的群眾，在郭先生的懇求呼籲下，才制止了可能的暴動。

那場選舉的青年參與者也是見證者有邱義仁、吳乃仁、吳乃德、林正杰、范巽綠、賀端藩、田秋堇、蕭裕珍、黃毓秀、周弘憲、洪三雄、陳鈴玉等人，他們大多來自台大與東海的學生，帶領他們的是郭先生的秘書陳菊，這些人後來都成為黨外運動的佼佼者。

我沒有趕上這場盛宴，我的首役是1977年底的桃園縣長選舉。

在此之前，我就是一般的台灣年輕人，雖從父執輩感受到國民黨無所不在的惡質，高中以後也會去牯嶺街舊書攤翻找禁書，但念書的藝專，基本上是政治的化外之地，與世無爭。念完書當了兩年兵，無所事事。當兵的一些真實經驗讓我徹底痛恨厭惡國民黨，但也沒有想過如何去對抗。1977年7月偶然的機會，許信良的侄兒找到我競選總部看看。

這一看看就是天雷勾動地火，焚燒了二十年。

我參與之時，一些年輕人林正杰、范巽綠、賀端藩已在那工作了好幾個月，然而，對所有工作者來說選舉事務都是新生事物，沒有範本沒有模擬對象沒有參考，沒有任何人可以告訴你如何進行選舉。曾經參與1975年郭雨新選舉的他們，最多的經驗也就是在街頭發傳單。幸運的是，候選人許信良完全放任年輕工作者的想像，放手讓我們自由發揮。

當時我們想像源自兩大類：美國好萊塢電影的絢麗影像及想像中國文革

airiti

的衝撞激情。所以後來有了大字報牆，仿造的美國巴頓將軍演講台，悲情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祭壇，自由即席演說等等。基本上反映當時我們年輕人對世界混亂的一知半解以及對社會變革的期待。

那場選舉，因為策略成功，完全激起群眾對選舉勝利的渴望，看到群眾空前狂熱，人人都知道勝選是一定的，擔心的是國民黨會強行作票。尤其最後幾天地方黑道被動員，主要的助選員人身安全明顯受恐嚇威脅，投票前兩天我夾克內層放了一隻鐵錘，因為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投票當天，國民黨果然作票。擔任監票員的國小校長作票當場被揭發，引起群眾包圍中壢警察局，從下午到半夜，警局前面的車輛一一被翻倒，天黑後警方發射幾波催淚瓦斯，群眾散去復來，半夜以後，空無一人的中壢警局被群眾放火燒燬。

當天下午警局被圍時，我因為助選成為群眾熟悉的人，得以自由穿越群眾界線，進入警察局，看到警局內部人心惶惶，仿如喪家之犬，急急收拾抽屜物品，一個個從後門溜走。具體而微的威權倒台，活生生在我眼前演出。

戒嚴令下的這場暴動，接連幾天的報紙隻字未提，彷彿未曾發生過。直到一星期後，《聯合報》才有小小的報導。

中壢事件以及許信良的勝選被視為黨外的重大勝利，被壓抑數十年的政治異議分子看到了未來的希望，紛紛破土而出，往黨外集中靠攏。

1977年中壢事件到1979年美麗島事件，這兩年就是黨外從零星到集中，快速往組織化方向前進，像是一部聯合戰線疾行列車，只有一個目的地：反國民黨。沿途上車的，包括有一心一意的獨派、社會主義統派、自由主義者、福佬沙文主義者、女性主義者、環保主義者、革命家改革者、地方政客，五花八門兼容並蓄，有人等待已久有人臨時起義。經過不斷的串連與整合，1978年底有「黨外人士助選團」，1979年「黨外中央民意代表候選人聯誼會」，到1979年8月創刊的《美麗島》雜誌，各地設有服務處分社，組織系統明確，儼然就是沒有黨名的反對黨。除了串連整合，還有源源不斷的黨外雜誌書籍，面向大眾宣傳，但大部分的出版品都成為禁書。

我和林正杰於1978年春天，窩居在桃園縣長公館的一間小塌塌米房間，

沒日沒夜一個多月時間寫出《選舉萬歲》，這本書記錄前一年選舉實況也描述中壢事件整個過程，在出版前夕於裝訂廠被警總搶光。當天深夜，上百名荷槍實彈的憲警封鎖萬華小巷街區，不准人員出入。搶走以後，警備總部還送了張收條給裝訂廠，寫著：「茲收到保昇裝訂廠繳來……」。

但當天傍晚我們把先裝訂完成的兩百本運走，成為漏網之魚。爾後在選舉場中不斷出現翻印本。《選舉萬歲》(林正杰、張富忠著)成為後來黨外選舉的「教戰手冊」，也成為海外台灣留學生同鄉認識七〇年代末台灣現況的一個範本。

1978年我就是全職的黨外聯合戰線列車志工，串南串北走東走西，在陳菊帶領下，認識了很多人。左中右統獨，還有很多老同學老政治犯老前輩，聽了很多驚心的故事，大概都是一些經驗之談。特別記得兩段談話：

「富忠，你這猴小子，怎麼穿 sliba(夾腳拖)！到時候被警察追跑不快的！」

「審訊的時候，你自白什麼承認什麼，和你最後被判什麼沒有關係，判刑的輕重完全是上頭政治決定的！」

我後來盡量不穿夾腳拖，但還是被抓了。

至於被抓後自白承認與判刑的無關係，就在不久後的余登發事件和美麗島事件得到證明。

1978年底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選舉，受到前一年中壢事件的鼓舞，黨外新參與者極為熱烈，鄉土文學作家楊青矗、王拓，女性主義者呂秀蓮，左派夏潮系統的陳鼓應，中國時報記者陳婉真……，很有百花齊放之勢。全台各地的黨外候選人幾乎都在當地引起狂熱的風潮。

更重要的是，10月上旬成立「黨外人士助選團」，由黃信介先生擔任總聯絡人，施明德為總幹事。我從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宣傳品中，找到一個拳頭的圖案，黑白翻轉後加上兩串橄欖葉，作為助選團的標誌。12月5日在台北中山堂集會，有七百多人出席，這是黨外有意義的第一次組織。

我擔任陳鼓應、陳婉真聯合競選的總幹事，總部設在師大路，並在台大門口對面的新生南路上設置大字報板民主牆，擺明了就是要向學生宣傳。國民黨右派受刺激按捺選舉萬歲不住，在旁邊也設立愛國牆，兩牆對打並不

airiti

斷增加版面，從早到晚吸引無數學生觀看討論。（後來擔任《美麗島》雜誌實際總編輯的陳忠信，當時為桃園的張德銘律師助選，他寫了超過萬餘字的傳單：「台灣往何處去？」基本上就是向北京民主牆的魏京生致敬，準備在投票前夕發表。）

黨外聯合戰線包含了立場矛盾的統獨兩方人士，但顯然統派是少數另類。我在那年的夏末，被找去林義雄律師辦公室，在場還有年輕的夥伴邱義仁、吳乃德、田秋堃等人，林律師只問我一個問題：「你為什麼去幫陳鼓應助選？」意思很清楚：你應該是自己人，為何去幫統派？統獨立場不明確的標籤，後來就一直掛在我頭上。

這場黨外即將要大勝的選舉，因為投票前一星期，12月15日，美國宣布與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而被國民黨強行停止。國民黨面臨來台後最大的危機，黨內強硬派抬頭；另一方面，黨外陣營在停選的錯愕混亂後，決定繼續往組織化方向走並擴大陣容。當時高雄縣最大在野政治勢力是余登發家族，女婿黃友仁是縣長，媳婦余陳月瑛是省議員，余家初期並未積極參與黨外活動。停選後黃信介等人敦請年紀較大聲望很高的余登發擔任黨外領袖，得到余登發的首肯，決定1979年2月1日由余登發召集，在高雄縣舉辦千人黨外集會。

沒想到1月21日清晨，調查局逮捕余登發、余瑞言父子，國民黨宣稱：在去年10月捕獲的匪諜吳泰安供稱，曾將「革命第一號動員令」交給余登發父子，並派令余登發為「高雄台南地區最高指揮司令」。理由荒唐無比，鎮壓恐嚇殺雞儆猴才是事實。

這次逮捕造成風聲鶴唳的效果，連余家如此有力的在野地方勢力都可以任意蹂躪，意味著任何人都不安全。大家迅速聯絡商量，決定「遊行抗議」，眾人分批各自南下，約定第二天上午九點在高雄橋頭鄉余家集合。這決定在當時必須承擔深不可測的危險，雖然一年多前發生過中壢事件，但那是群眾自發起義，沒有人帶頭。而進行一場戒嚴令下有計畫的遊行抗議，是完全不同的事，無法想像會有什麼後果。

那天有三十位外地黨外人士到達橋頭鄉余家，包括許信良、黃順興、姚

嘉文、施明德、邱連輝、陳鼓應、陳菊、陳婉真……，等待在余家門口的是大批警察。大家把預先寫好自己名字的彩帶披上，拿出標語布條，警察擋在門口阻止。當時，施明德衝上前去，對警察大喊：「開槍！開槍！我們不會躲避！」一時間眾人衝出，拉開布條遊行。連同余家工作人員共五、六十人，一路喊口號一路走在沉默的橋頭小街上，當地居民沒有加入，甚至有人關起門窗，深恐發生大事。

事後，參與遊行的黃順興說：「我一路上一直緊張想著，會不會像二二八事件那樣，前面巷口出現機槍掃射。」幾位參與者南下前都慎重交代了後事，戒嚴令下示威遊行，是要冒生命危險的。

當天下午返北的巴士上，參與遊行的曾心儀說出一句名言：「國民黨的戒嚴令已經不是處女了，我們強暴了這三十歲的老處女！」

余家父子後來被判八年及三年徒刑，罪名是「知匪不報」和「為匪宣傳」，擔任匪諜角色的吳泰安在審判中力求表現，曾經承審法官很生氣地問辯護律師姚嘉文：「姚律師，你認為吳泰安是假匪諜？」結果吳泰安搶話說：「姚律師你要有良心一點，我不是假匪諜，我是真匪諜，我是愛國的匪諜！」這個愛國的匪諜最後被槍斃了。

橋頭遊行我沒有參與，因為那時我人在美國。我於1978年12月14日赴美，參加妹妹12月底在紐約的婚禮。那是第一次出國，先在東京停留三天，住在旅日的叔叔家。第二天一早，叔叔買來所有的報紙，頭版都是：「中美建交！」

在東京的第二天，我請堂哥帶我到神田神保町書店街的**內山書店**，準備大肆購買「禁書」。我永遠記得走進書店那一剎那，不由自主地回頭一望，擔心有人在背後監視！國民黨軍事戒嚴統治的威力真是無遠弗屆，我相信自己經過1977、78年的黨外洗禮，應該是最不怕國民黨的人，而且已經是在東京了，但身體的記憶就是如此精準的反映內心深沉的恐懼！

妹妹婚禮結束後，我帶著所有的行李投靠住在首府華盛頓的黨外前輩郭雨新先生，一個月後又飛到芝加哥找左派林孝信。郭先生是陳菊安排的，孝信是夏潮王津平介紹的。接下來半年，分別由郭先生和孝信安排，我走遍全

airiti

美國台灣留學生社團及同鄉會，作了二、三十場以上的演講。那段時間也認識所有在美國的獨派、統派、左派、右派活躍分子，進行過無數回的客廳旅館討論談話。有在保釣運動後到聯合國上班的，有成日臆想如何在台灣進行武裝鬥爭的，有面向美國國會山莊以遊說為主的，有在左翼原典中苦苦探索尋求台灣革命道路的。

郭先生是政治立場溫和的黨外前輩，1975年敗選後黯然赴美，定居華盛頓依然持續關心台灣現況，在台灣備受敬重的他卻因為資源的爭奪受到地頭蛇台獨聯盟陣營排擠打壓；《台灣科學》月刊創辦人林孝信，像苦行僧般的社運工作者，一年365天一天24小時，永遠不知疲憊地尋找接觸年輕人進行人的改造工程。

飄蕩十個月後，遠離台灣現場終究覺得空虛，於是在10月底返台。回台灣還驚動了警備總部，他們事先通知了不知情的我父母，黨外陣營擔心我在美國的爆衝言論可能會被逮捕，由姚嘉文、陳菊到機場接我。回國後就進入《美麗島》雜誌社工作。

1979年初橋頭事件後，國民黨鐵腕手段益加猖狂，什麼垃圾步都使出來。包括將桃園縣長許信良以「擅離職守，參與簽署不當文件及未經核准的遊行」罪名免職；在省議會及黨外人士服務處成立場合進行軍事演習，甚至出動坦克車周邊建築頂樓架設機關槍；逮捕地下刊物《潮流》的陳博文、楊裕榮；逮捕老政治犯張化民、作家陳映真、李慶榮；在多次黨外集會以軍警封鎖現場用消防車水柱沖散聚會者，並用電棍驅離群眾；高雄屏東黨外服務處被黑道搗毀，工作人員被斧頭砍傷，連立法委員黃信介在台北大龍峒的家也被黑道以斧頭搗毀傢俱。

面對國民黨的暴力手段，黨外陣營仍是堅定往組織化方向走。8月《美麗島》雜誌社正式發行成立，設有社務委員、編輯委員，包容統獨兩派人士，全台各縣市廣設服務處，9月以後陸續成立。

在國民黨暴力恐嚇威脅挑釁下，黨外就像一部高速行駛的列車，轟隆隆向前衝，但煞車系統失靈，終究要撞上戒嚴的紅線。

面對多次暴力事件後，《美麗島》雜誌社決定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

airiti

日當晚在高雄舉辦遊行，這次遊行一直未得到警備總部的批准，但雜誌社堅決要如期舉辦。12月9日晚上，宣傳車在高雄鼓山分局前被攔下，警察把工作人員姚國建、邱勝雄扯下車，以頭下腳上的方式拉進分局，兩人的臉一路撞擊階梯，牙齒都斷了，進分局後還被眾警狂毆。半夜到醫院探視他們的朋友看到臉腫如豬頭的兩人，無法分辨誰是誰。消息傳出後，黨外陣營譁然憤怒。第二天所有報紙頭版新聞卻是：「高雄地區戒嚴司令部宣布：冬令宵禁提早自十日舉行」。

12月10日晚，黨外列車終於撞上紅線了。

三天後凌晨，國民黨逮捕十四位「首謀」，之後陸續抓了將近一百人，最後以軍法叛亂罪名起訴八人，以司法暴行脅迫罪名起訴四十五人。除了姚國建以外所有被起訴者都是台籍。

我是十四人之一，半夜在《美麗島》雜誌社內被抓，移送景美軍事監獄。

在警備總部保安司令部(台北博愛路總統府後面)偵訊室，不知經過幾日幾夜的疲勞審問，島嶼天光清晨之際，早班公車開過博愛路的聲音在冷冽的冬日空氣中特別清楚，穿過數道牆壁，傳進昏昏欲睡的耳際。我認了「叛亂」，不承認是過不了關的，作了無數篇的作文以及無數次的筆錄，寫了又改改了又寫，原來警總在編織一個完美的叛國故事集團圖像，必須要每位參與者的說法兜得攏。但突然有一天，訊問的軍事檢察官來做不知第幾回的筆錄時，他照例問：「你有沒有叛亂意圖？」我正要回答，筆錄的書記官立刻接口：「沒有」。我就從軍法被降格為司法了。後來我的判斷是，美國最後一任駐台大使安克志的因素。審訊期間《中國時報》登了一則新聞，說我在美國停留時曾偷偷進入中國大陸，此次高雄事件就是接受中共指示云云。我姐夫和安克志的兒子熟識，找上在波士頓的大使，請他出面澄清。安克志接受《中國時報》訪問，證實我在美國期間直到回國都沒有出境紀錄。國民黨再惡霸，還是要巴結主子的。

獨裁政權的本質是殘酷的，對反對者施以肉體的凌虐心理的恐嚇。南部被抓的基層工作人員或黨外支持者受到最粗暴的待遇，他們一進憲兵隊就被釘上腳鐐，每天被群毆毒打，所謂的照三餐打；北部的首謀，都經歷了疲勞

airiti

審訊，嘴巴比較強硬的，紀萬生、林義雄等人則被刑求得很慘。我在保安處大概一個多月後第一次由憲兵帶著去洗澡，在走廊間不期而遇另一位犯人，他理了光頭臉紅腫變形，我認不出是誰，聽他叫出我的名字，原來是紀萬生。在洗澡日前一星期的一個晚上，一位審問者氣急敗壞的對我說：「你們那個紀萬生太可惡了，到現在還罵我是狗！」

國民黨逮捕審判《美麗島》主要活躍分子，企圖埋葬黨外組織化的火種。面對叛亂罪唯一死刑的威脅，八名軍法被告沒有投降沒有求饒。由於美國的壓力以及全球華人的反彈，蔣經國被迫公開審判，報紙也反常全文刊登軍法審判八人在法庭上的所有談話，原本是要上演一齣鎮壓恐嚇的審判戲，反而成為美麗島的宣傳大戲。

1983年底，坐牢將近四年後出獄，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台灣。

雖然還是存在這樣那樣的威脅恐嚇，雖然戒嚴令還在，但人民不怕了。黨外雜誌如雨後春筍，一本接一本出現；黨外當選的民意代表公職，人數倍增組成了黨外公政會，非公職的黨外雜誌工作者則組成黨外編聯會。《美麗島》事件不只沒有摧毀黨外，反而茁壯了黨外，成群年輕人大學生大批參與進來，反抗國民黨成為青年的顯學了。黨外活了下來，甚至還發展到公職／非公職的對立局面。

我也看到國民黨原本牢牢控制的社會，因為政治層面受到挑戰，所有死水一灘的各領域都開始鬆動了。（吳永毅《左工二流誌》書寫的，小蔡向洛杉磯同志發出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呼籲，胎動期應該就是八〇年代初。）

出獄後我隨即進入《前進》雜誌社，當時已有多位「海歸」學者在黨外陣營遊走，他們大多在大學任教，謹慎隱藏海外的脈絡，哈佛回來的鄭村棋化名紀國棟，經常在前進雜誌社出入寫稿。

第二年我擔任黨外編聯會第二任會長。面對著社會鬆動的新時代，我和副會長劉守成、總幹事范巽綠、副總幹事汪立峽以及蘇慶黎多次研討，在編聯會成立「台灣史、社會經濟、生態消費、勞工、婦女、文化、少數民族」七個委員會。

這些委員會陸續成為社會運動的先驅組織。但後來的黨外一路往政治運

動發展，社會議題都消失了，只留下標題，內容不見了。對黨外政治運動來說，國民黨的社會控制包山包海，所有反抗矛盾自然指向國民黨。黨外的反抗實踐相對而言極為輕鬆，只要指向國民黨，一切都順理成章。黨外更把所有社會運動的能量視為自身天然的永遠的附庸。相對輕鬆的政治反抗運動，讓黨外／民進黨成為無需思考無需面對自身內容的政治力量，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

之後1980至1990年代的台灣，就是無止盡的街頭對抗，為了各種政治議題、社會議題，黨外發動——後來民進黨發動的，社會各領域自行發動的，台北街頭終日盡是示威場面，警察打人是天經地義流血驅散是家常便飯。但這些街頭運動成就了什麼呢？

從七〇年代後期開始的黨外反國民黨聯合戰線，包容統派、獨派、左派、右派，經過《美麗島》事件，再起的戰線逐漸把統派驅離，把左派作為裝飾，以台灣主體性／反國民黨／反中國為無限上綱，走進權力遊戲的王國，樂此不疲。

黨外運動擊垮了國民黨的威權獨裁統治，從而釋放台灣社會長期被鎮壓的社會矛盾，這樣的成就我都感覺與有榮焉；但黨外／民進黨卻無法回應社會各領域興起的挑戰，到今日民進黨企求與社運同盟，卻成為相當難堪的局面。

我的黨外時代從激情開始，最後在政治權力的爭奪失敗逐漸淡出。吳永毅走了一條困難的路，但蔣介石仍然在中正廟微笑的台灣社會會認真的回應他嗎？